环球瞭望

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的大国责任

□罗建波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强调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推出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迈出了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历史性一步，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信心和能力，再次彰显了中国不断提升的大国责任。

亚太自贸区建设能为区域合作带来什么

亚太地区是当前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涵盖了中、美、日三大经济体及东盟等地区经济集团，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的57%、世界贸易总量的46%和全球人口的40%。可以讲，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多边贸易合作的进展及成效。

早在2006年，APEC各经济体就同意将亚太自贸区作为长期愿景。但此后亚太自贸区建设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加上WTO谈判艰难而难有突破，亚太国家纷纷转向发展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数十个各种形式、成员或多或少的自贸区大量涌现。由于各自贸区的标准和规则各不相同，对亚太地区开展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带来了不利影响，直接加剧了亚太贸易的“碎片化”趋势，从长远看，显然不利于区域贸易整合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因此，推动区域整合进程，克服当前亚太地区FTA众多所带来的“面条碗”效应，符合亚太经济合作及各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在东道主中国的大力推动下，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致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批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正如习近平所言，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将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也将使太平洋两岸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广泛受益，为亚太经济增长和各成员发展注入新活力。因为在理论上，亚太自贸区建设将极大便利区内的商品、资本、服务、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消除多个FTA并存且“互不兼容”所带来的制度、规则不统一的问题。

在此前亚太地区广泛兴起的FTA中，有两大多边贸易谈判最为引人瞩目：一是以美国主导的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目前谈判已经扩展至12个国家；二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包括东盟十国及中、日、韩、澳、印和新西兰。TPP旨在构建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规则，但它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政府采购、透明度等议题上的高标准超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所能接受的程度，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缺位更使TPP缺少足够的代表性。RECP仍主要以传统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特色，且没有包括美国这一世界最大经济体，因此其相关贸易规则恐难真正代表未来多边贸易规则的发展方向。两大区域贸易安排的某种“争锋相对”以及存在的某种地缘竞争，显然不利于亚太区域开展更大规模的自由贸易，而它们各自存在的某种缺陷与不足更使建构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亚太自贸区有了更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如果亚太自贸区最终建成，将成为当前世界最大的区域多边贸易安排，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探寻亚太区域合作的“第三条道路”，正是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初衷。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指出，亚太自贸区将是一个全面的自贸协定，并在现有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予以发展。如何确立亚太自贸区的远景目标及相关政策和规则，如何实现不同形式FTA间的相互协调与融合，特别是如何处理TPP和RCEP之间的关系，将是决定未来亚太自贸区是否具有足够包容度、吸引力乃至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客观地讲，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还只是一个远景目标，目前还处于战略研究阶段。由于成员国众多且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利益诉求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亚太自贸区建设显然不会一帆风顺。有分析认为，目前APEC还只能解决亚太自贸区“做不做”的问题，并未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但即便如此，考虑到区域一体化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是亚太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中国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努力无疑有助于增进各方在区域贸易安排上的共识与互信，推动区域整合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因此，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建设性的。

中国能为亚太区域发展贡献什么

经过改革开放36年来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据统计，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以及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决定了中国的发展一开始便具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溢出”效应。因此，中国的持续发展对本地区而言本身就意味着巨大机遇。

对于亚太经济发展，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首的“雁阵模式”以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模式，而美国对亚太经济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亚太地区发展的贡献日益增长，与亚太各国的贸易和产业分工日益紧密，正在有力改变着亚太地区的传统经济格局。中国承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启动，正是中国对区域合作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此次北京会议上，中国除了提出深化区域合作的新思路、新构想，还积极向亚太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APEC开展机制和能力建设，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必将有助于开拓亚太经济增长新源泉，提升地区竞争力，符合各成员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需要。

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还能发挥一种独特的“桥梁”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严峻的减贫和发展重任，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紧密的相互依存，这种多元的身份和角色使中国既能切实感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也能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因此，中国完全有能力协调各方在亚太区域合作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

最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各国互利共赢的诚意和行动，也是对地区稳定、合作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提出并努力推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克服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一再上演的“大国政治悲剧”；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坚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国提出以“正确义利观”指导经济“走出去”，努力打造与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事实证明，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正在积极利用自身发展推动各国的共赢与多赢。中国发展不仅惠及自身，也必将造福亚太和世界。

中国外交将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力推亚太自贸区建设，愿意为本地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中国在逐步实现自身发展后不断提升的大国责任。世界不会忘记，早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时，中国不仅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而且还慷慨解囊，帮助其他东亚国家摆脱危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努力保持了自身经济的较快发展，还通过增加对发展中的经济援助、增持部分发达国家的国债来提振世界应对危机的信心与能力。亚太自贸区建设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展现大国形象的又一重要举措。

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积极作为，还展现了中国筹划外交战略布局、妥善经营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更为宏大的战略构想。在中国的外交棋盘中，周边乃至更为广泛的亚太地区是中国实现发展的战略依托，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基础和平台。如同任何大国要真正走向国际社会，都需要努力经营好本地区国家关系一样，中国也需要不断创新合作方式以增进与周边地区的战略合作。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新构想，以联接欧亚两大洲、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洋，同时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力图推动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发展与整合。“东”“西”两向的同时布局，展现了中国正在打造大国崛起的“一体两翼”。

从长远看，中国的上述战略布局及相关努力，必将有助于增进自身在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从而提升大国崛起所必需的软实力。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在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仍然不高，在重大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仍然有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要“融入”国际社会，其实质仍然是被动接受国际规则，今后则需要更多地强调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由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塑造者”转变。过去十余年来，中国逐步提高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成为G20的创始国和积极贡献者，与巴西、印度一道搭建了金砖国家组织并筹划组建了金砖银行，这都是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重要体现。作为系列组合拳的重要一环，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开启以及中国作用的发挥，在有效整合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必将推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提升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必将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更加有为，中国的大国责任与世界贡献也必将有进一步提升。

用碳市场解“气候资金结”

□郭兆晖

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到2010年的坎昆，到2011年的德班，到2012年的多哈，再到2013年的华沙，全球为搭建一个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机制，展开了一场艰苦的“马拉松”谈判。至今，仍未达到终点。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步伐却并未因人类的行动迟缓而改变。

诚然，道德无法解决气候问题。气候问题的解决却首先依赖于每一位地球居民拥有一份“公德心”。接下来如何破题？我们需要理性、科学且负责任的声音。

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有很多亮点，近期媒体上有铺天盖地的分析，但是诸多言论似乎都忽视了一个气候变化论战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资金问题。具体而言，西方的哪些国家和企业将提供资金以及提供多少资金来资助很多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所在的发展中国家的低碳革命。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而发达国家在其从工业革命的两百多年来，占据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大部分。因此，在2007年召开的巴厘岛气候大会确定的“巴厘岛路线图”明确提出发达国家要给予发展中国家以资金支持。由此，资金问题成为历次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的焦点。

根据之前气候大会协议，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于2010年至2012年期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总值为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并于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而刚结束的气候峰会的“主席总结暨成果文件”称，峰会成果是“公共和私营部门明确了气候融资途径”。

时至近日，第一笔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的承诺期早已过去，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一分钱的“真金白银”入账。发达国家借口经济危机，拒绝给出提供资金的时间表。反而发达国家还声称已经通过所谓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气候融资途径”，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类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形式，完成了义务。

如果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实质上已经形同虚设。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呢？

《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运用市场机制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模式——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直白地说，就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卖钱的方式，让企业获取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

既然我们不能从发达国家获得减排的支持资金，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创造资金。因此，构建中国自己的碳市场迫在眉睫。

我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十八大着重提到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要“积极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行碳交易制度”。今年，国家发改委已经提出在2011年底开始的七个省市的碳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建立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机制。

时不我待，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重心应当从纷繁复杂却了无成效的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谈判，转移到加快构建中国自己的碳市场，进而为我国企业减排提供资金支持，把“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通过发展我国碳市场真正获取“全球性”的减排资金支持，应该着力做好三个步骤。

首先，国际碳市场的定价权在欧盟手中，以欧元标价，健全我国碳市场的碳价形成机制，进而建立一套以人民币标价的碳市场定价标准。其次，国际碳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700亿美元，而我国碳市场的规模仅3.38亿人民币，我们需要在试点基础上，扩大碳市场规模，进而建立与我国第一大碳排放国地位相适应的碳市场。再次，在掌握定价权、获取规模优势之后，我国的碳市场要与国际碳市场连接，这样我们便可以把“碳”“出口”到发达国家，用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谈判的“嘴上功夫”来赢取他们的资金支持。

战略视角

热点透析

从G20峰会看俄美关系

□宫秀川

刚刚结束的G20峰会，本应专注全球的经济问题，却成为了西方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会议。早在峰会开始前，东道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就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欺凌弱小以及试图“重建沙皇和苏联过去的辉煌”，而且阿博特早就放出风来，声称他要在G20峰会上“抱摔”普京。11月15日，在普京出席G20峰会前夕，俄罗斯4艘军舰驶向了澳大利亚昆士兰海岸，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冷战的气息。

先不说阿博特有没有“抱摔”普京的能力，但是从东道主的勇气可以看出来，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跌落到近20年的最低点，就连远在南太平洋的阿博特都在向普京叫阵。西方指责俄罗斯让乌克兰东部局势再度升级，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俄罗斯在过去几天把武器、装备、火炮、装甲车和火箭弹越境运往乌克兰。普京明显地违反了停火协议，俄罗斯派出的战机也直接威胁到了北约外部边界的民航航班。”的确，乌克兰问题持续发酵，积累了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不满，而G20给这种不满提供了发泄的平台。

这不是冷战

进入21世纪后，其实确切地说，自从普京当政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龃龉不断，与美国的关系更是每况愈下，有时甚至剑拔弩张。从伊拉克战争到颜色革命，从反导条约到格鲁吉亚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伊朗核问题，从车臣恐怖主义事件到利比亚危机，从斯诺登到克里米亚，等等，可以说，新世纪国际上的大事件的背后都能看到俄美之间的角力。甚至可以说，冷战结束10年后，国际问题，尤其是国家间的政治，基本都是围绕着俄美矛盾展开的。

如何来看这一矛盾重重的大国关系？

媒体喜欢把矛盾突出，找噱头的职业惯性自然就找到了“新冷战”这一关键词。有的甚至还把今日的俄美矛盾和美苏矛盾来进行比较，结论是冷战在持续。这是不正确的。今日的俄美无法跟昔日的美苏来进行对比，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是全方位的：意识形态上，柏林墙和铁幕把世界分开；军事上，北约和华约让欧洲一直处于战争的边缘；经济上，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又让各自集团的成员加强了经济间的联系。而今天的俄罗斯，无法重续冷战时期苏联的“辉煌”，因此不能用新冷战来定义今日的俄美关系。一方面，冷战时期，美苏互相诋毁对方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但在当前，除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抨击以外，双方基本就不以这种方式进行对抗，至少在意识形态上，俄罗斯并不排斥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目前俄美也没有像美苏争霸那样，拟以军事手段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俄美关系因为地缘矛盾而跌入低谷，甚至俄美关系破裂，都不可能回到冷战上。

制裁俄罗斯谁输谁赢

7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俄罗斯追加一揽子经济制裁，目标直指俄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9月12日，欧盟对俄罗斯新制裁方案生效，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其实，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清单可以看出，制裁措施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主要还是集中在与军事密切相关的行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措施对俄罗斯的经济还是有立竿见影的影响，在制裁生效的当日，卢布汇率在离岸交易市场也随之创下了最大的跌幅。俄财政部指出，如果西方采取更强硬制裁措施，俄罗斯经济将呈现“龟速”增长。由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于依赖于能源，近几年的能源价格的持续下跌让俄罗斯经济已经停滞增长，这次制裁将雪上加霜。有分析指出，通过上述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经济今年将损失230亿欧元，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明年将损失75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受此预期影响俄罗斯卢布也将大幅贬值。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一国的制裁往往是双刃剑，在打击俄罗斯经济的同时，西方其实损失也不小，尤其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令本已羸弱的欧洲经济再次蒙上阴影。众所周知，俄罗斯不是贫困国家，它资源丰富，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因此也能够承受住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官员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硬碰硬地对抗，俄罗斯可以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坚持一年，而西方如果没有了俄的天然气，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德国媒体的文章认为，欧洲30%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目前欧盟和美国还没能就能源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欧盟各种新能源政策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在能源方面，欧盟的制裁并不敢涉及俄罗斯供应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大宗商品。而且，欧盟制裁涉及金融领域，这对欧盟有着很大的潜在危险，因为无论欧盟国家还是美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大量贷款，制裁俄罗斯将会加大这些贷款的安全性风险。

从长远来看，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对整个欧洲产生负面影响，令欧盟经济更多依赖美国。制裁将让依赖德俄贸易关系的德国企业失去35万个工作岗位。另外，欧洲专家估算，在最初2年，给俄欧双方造成的损失基本相当，约为1000亿欧元。据德国商会的数据统计，在俄罗斯的德国企业约有6200家，投资额达200亿欧元。德国商会最近的调查报告显示，欧盟第一轮对俄制裁就使德国对俄出口减少17%，损失约为60亿欧元。这些数据只是表面上的经济影响，其实对一个大国的制裁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对投资信心的影响，资本一旦预期到风险，就会逃之夭夭。如果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持续下去，投资者就会看衰欧洲经济复苏，资本撤离就顺理成章，欧元贬值就会持续下去。而相对来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是资本很好的避险之地，虽然这次制裁美国也参与其中，但是对美国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加上最近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错，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美元自然也将水涨船高。制裁俄罗斯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俄美关系将维持有底线的“糟糕”常态

应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似乎更从容。普京总统表示，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有利，制裁将迫使俄罗斯优化经济结构，不再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另外，俄罗斯在被西方制裁后，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的贸易协定，5月，中俄两国达成了一项合同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的协议，期限为30年。自从2010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后，两国贸易额持续增长，2013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接近900亿美元。而今年，随着俄罗斯与欧洲贸易规模的缩减，中俄贸易数字也会急剧增加。

11月11日，就在美欧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谈判陷入僵局之时，俄罗斯又和伊朗签署了新的核电协议。根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消息，这份协议的签订旨在帮助俄罗斯扩大在伊朗布什尔地区2个全新核反应堆建设。另外2个核反应堆将选择性建设，同时还在伊朗其他地区建立4个反应堆。此时，伊朗一口气与俄罗斯签订8座核反应堆计划，令欧美十分震惊。根据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去年11月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伊朗应于今年7月20日之前就该国核计划作出妥协，换取西方国家缓和制裁，双方同时寻求通过谈判达成全面协议。由于未能于7月20日之前达成全面协议，双方决定将谈判延长至11月24日，并争取在此之前达成全面协议。而11月9日，美国国务卿刚刚在伊核谈判问题上碰了软钉子，刚过了不到一周，俄罗斯和伊朗就签署了协议，怎能不让西方如鲠在喉。

在乌克兰问题爆发后，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全面调整了对俄政策，在维持与俄必要合作的同时，对抗与对立的一面将大幅度上升。对抗和对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成为俄与西方关系中的主要方面，遏制与反遏制将会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伴随着欧盟扩大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更威胁到欧盟对美国的信心。遏制俄罗斯在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压制俄罗斯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将会成为未来美国对俄主要战略。而俄罗斯自然不会任由美国在周边地区为所欲为地遏制，更不允许北约继续向乌克兰渗透。俄罗斯为了反击美国的孤立政策必然会“向东看”，扩大与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关系，恢复与老牌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

俄美关系矛盾重重是各自不同的大国思维和战略利益，以及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的表现。在对待国际事务上，美俄在理念上也存在根本性区别。俄美在政治哲学和国际战略观上的巨大差异让两国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的认知基础。当然，在看到遏制与反遏制的俄美角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暗流涌动的两国相互所需。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美国都不可能绕开俄罗斯单独行事，而俄罗斯更需要西方的市场和稳定的战略环境。由此可见，俄美之间在未来几年维持目前的“糟糕”状态是常态，但俄美关系也不会闹得太僵。